

打响全民族抗战第一枪——

奋起御侮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

□ 黄宗慈

1929年秋,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日本西京召开大会之前,以余日章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沈阳举行筹备会。1931年9月23日,筹备会主任阎宝航偕辽宁省商、工两会会长金哲忱、卢广绩等从沈阳设法逃出敌人虎口,抵达北平,次日即会同已在平的高崇民、王化一等发起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(简称为救国会),以“抵抗日人侵略,共谋收复失地,保护主权”为宗旨。救国会于9月27日正式成立,会址设于旧刑部街奉天会馆内。在北平的东北人士踊跃参加,入会者达400余人(会员不以东北人为限)。会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,由会员大会选举执行委员会,由执行委员会推选常务委员;常务委员下设,设总务、军事、政治三部,各部设正部长一人、副部长二人,均由常务委员兼任。总务部正、副部长为卢广绩、高崇民,军事部正副部长为王化一、彭镇国、熊飞,政治部正、副部长为阎宝航、杜重远(杜在上海未到任,嗣推霍维周继任)。此外,还设有监察委员会及特种委员会,如军事及政治委员会等。

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组织成员,上层人物占少数,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占绝大多数。从党派来说,国民党如梅公任(又名梅佛光)、吴焕章、黄剑秋及“改组派”钱公来等,青年党如王捷侠、霍维周等都曾参加。中共地下党员和在党的影响下思想进步的青年,则有宋黎、张希尧、宁匡烈、张雅轩(现名为张金辉)等。阎宝航、卢广绩、王化一、车向忱等,则属于大多数的无党派。

当时摆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面前的紧急任务,是立即开展抗日宣传和组织人民抗日的武装斗争,以期唤起全国人民共起抗日,并对日寇进行破坏扰乱,以阻挠其进一步扩大对我国领土的侵略。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后,即以宣传工作及军事工作为中心,展开并推动了多方面的抗日活动。

为了联络马占山、李杜,策动辽东救国军唐聚五、邓铁梅等部及沈阳、辽西的义勇军,救国会先后派车向忱、黄宇宙、宋黎、张雅轩、苗可秀、高鹏、纪廷榭、潘振祺、魏兴华等及大批政工人员秘密出关,开展工作。在宣传工作方面,除了组织宣传队,沿平

津、平汉等铁路线扩大宣传之外,又以北平、天津、上海为宣传重点地区,增派王化一、徐靖远等到平津各大学,阎宝航到南京、上海各地,报道“九一八事变”后东北人民抗日活动及东北义勇军奋起抗战的情形。

为了训练出关抗日青年,曾组织学生军集中训练,为期两三个月。为了安置逃亡进关的东北青年学生,培养抗日的骨干力量,开办了东北学院(后改名东北中学)和东北难民子弟中学,以王化一、李梦兴分别担任校长。东北大学不久亦在北平复校。三校开学后,均加紧实施军事训练。言论机关则办有《救国旬刊》《复巢月刊》与《东北通讯》。为了安置抗日人员的眷属及逃亡关内、一时无法谋生的东北人民,设立了收容机关,名曰东北难民教养院。为了表彰为国捐躯的抗日烈士,设有昭义祠。以上种种措施,都以“打回老家、收复失地”为指导方针,各方配合,积极创造条件。

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组织与抗日活动,纯系东北民众出于爱国热情、民族义愤和愤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,自动自发起而保家卫国的行动,事前无张学良的授意批准。但是张学良在精神和物质上都曾给予许多有力的支持,直到他被迫下野为止,如鼓励抗日将领,维持救国会同志生活,及发行爱国奖券,以接济义勇军和弥补救国会及东北中学的开支,即其事例。

为了督促国民党政府实行抗日,救国会决定组织赴京请愿团。此时适逢国民党宁粤两方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,救国会乃于10月28日召开全体委员会,请愿团先去沪向国民党和平会议请愿,再返回南京请愿。请愿的目的为:一、响应和平会议,促成统一政府;二、团结全国爱国力量,一致抗日;三、督请南京政府出兵收复东北失地。

11月5日,请愿团大队齐集北平火车站,准备出发,路局受南京政府暗示,不给挂车。张学良为敷衍南京政府的面子,也表示劝阻,请愿团未予理采。南下列车行将开车,请愿群众纷纷卧轨,阻止开行。青年们大声疾呼,向乘车客人宣传南下请愿的重大意

义,有的声泪俱下。全体乘客深受感动,自动让出列车,并有一部分人要求参加南下请愿。顿时,这一列车变成了请愿专车,在车上下车欢声雷动之中,驶出了北平车站。

11月7日早请愿团到达浦口,过江后,经在南京的东北群众协助,即时转搭沪宁列车去上海,当日深夜抵达上海南站。江问渔、陈立廷等多人代表上海市各爱国团体到站欢迎,并将请愿人员分别安置在中华职业学校、西成小学、上海中学、务本女中四处。

和平会议已于请愿团到沪的前夕闭幕,因此,请愿团决定推出高崇民、卢广绩等为代表,会同原已在沪的阎宝航去会见胡汉民、汪精卫;请愿大队则由王化一率领在上海游行示威。汪精卫在接见代表时大谈其对国事的意见,滔滔不绝,但毫无要领。胡汉民接见时,则戒备森严,代表每人身后站着一个便衣。胡汉民对张学良大肆非议,对东北的沦陷则谓“国之强弱不在疆土之大小”。一场激烈争辩之后,不欢而散。

游行大队在倾盆大雨下,精神振奋,意气激昂,先绕行南市,然后闯入英租界。英租界当局出动大批武装英国军警拦阻,并排列水龙、机枪以示威慑。正在相持不下时,经上海各界人士出面劝阻,大队始转回南市,沿途高呼口号,散发传单,引起上海人民莫大的同情。

11月10日,请愿团返回南京,住金陵大学的体育馆和礼堂的地板上。次晨,请愿团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,吴铁城、张继两人代表蒋介石向大家讲话,劝大家早日北返,不要受别人“煽动”,并说中央一定有办法等语。请愿团当场驳斥了他们所谓受别人煽动的说法。当时听说蒋介石躲在中央军校,于是,大队人马在激昂愤怒的情绪下,转赴中央军校。此时大雨滂沱,中饭未吃,请愿团冒着大雨,忍着饥饿,一口气赶到中央军校。蒋介石推延到下午三时才出来接见。这时,天津学生请愿团也赶到参加。

(连载一)

傅斯年——
民国知识分子的典范

□ 徐新

傅斯年(1896—1950),字孟真,山东聊城人。中国近代著名学者、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,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、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。他富有民族气节,极具战斗精神,宁肯断头,决不屈膝,绰号“傅老虎”“傅大炮”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北平学者集会,谴责日军侵华罪行,傅斯年即席演讲,首创“书生何以报国”的话题,唤起了民众的觉醒,众人纷纷各抒己见。当时,日本为寻找侵华的借口,利用御用文人写文章,杜撰“满蒙”在历史上非中国版图之所有。为驳此谬说,傅斯年挑灯夜战撰写《东北史纲》,一方面驳斥日本人指鹿为马的胡说,以正视听;另一方面让国人了解东北历史,激发爱国爱党激情。《东北史纲》从历史角度详细地论证了东北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史实,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民族主义价值观。此书后由李济翻译成英文,送交国际联盟。《东北史纲》一书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明确指出东北三省“为中国之一部,此为中国及各国公认之事实”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抗战胜利后,傅斯年担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,他坚决反对继续聘用日伪时期在伪北大任职的教授。他认为这些人毫无民族气节,失去了知识分子的良知。与傅斯年颇有交情的教授容庚听说傅斯年的申明后非常着急,就去找傅斯年理论。傅斯年以前对容庚是相当看重的,这时却拍案而起,斥责容庚。此后,容庚到岭南大学任教,再也未能迈进北大的门槛。

孔祥熙与蒋介石关系渊深,居国民政府财政部长、行政院长达十年之久,劣迹昭著,世人敢怒不敢言。傅斯年在担任国民参政员时,曾经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院长孔祥熙,上层虽不予理睬,但后来还是让他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劣迹,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。蒋介石为保护孔祥熙,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。在傅斯年的穷追猛打之下,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免去孔祥熙的职务,改由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院长。

1947年,傅斯年再次出战,在《世纪评论》上发表《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》一文,对宋子文胡作非为进行抨击。傅斯年的炮轰,毫无疑问在朝野上下掀起轩然大波,社会舆论也紧盯着宋子文,使得宋子文的处境十分尴尬,只好在人民的唾骂声中辞职了。

珍赏

春在枝头玉兰花

□ 缪士敏

2005年3月,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套《玉兰花》特种邮票(附图),共4枚,邮票图名分别为“玉兰”“山玉兰”“荷花玉兰”和“紫玉兰”,每一枚的面值都是80分,影写版印,由龚文植负责邮箱设计,郝旭东负责边饰的设计。这套邮票采用中国传统工笔画的方式,分别以绿、蓝、紫、青四色为底色,衬托玉兰花的艳丽高洁,芬芳怡人的特点,给人以无限优美的艺术享受。

玉兰,别名白玉兰,也称迎春花、望春花、玉树或玉堂春,因其“花九瓣,色白微碧,香味似兰”而得名。玉兰为木兰科落叶乔木,在我国已有2500年栽培史,先花后叶,早春盛开,花朵硕大,洁白如玉,一干一花,单生于枝顶,朵朵向上。那成片绽放的玉兰,远看如雪山琼岛,蔚为壮观;近观似锦衣霜袂,秀丽高雅,美不胜收。

玉兰花不为缙尘所垢,其冰清玉洁之质,素净莹润之容,博得文人墨客称颂备至,如明代书画家文徵明直言玉兰:“缔约新妆玉有辉,素娥千队雪成围,我知姑射真仙子,天遣霓裳试羽衣。”明代书画家沈周在《题玉兰》诗中吟道:“翠条多力引风长,冲破银花玉雪香。韵友自知人意好,隔帘轻解白霓裳。”明代画家王谷祥在《玉兰》诗中赞叹:“皎皎玉兰花,不受



丝路览胜

文殊山访古

□ 张天雁

文殊山,原名嘉峪山,位于酒泉、肃南、嘉峪关三县市的交界处,距酒泉市15公里、嘉峪关市20公里,是祁连山北麓一条支脉,素有“小西天”之称。

文殊山山势由东南向西北逶迤蜿蜒,峰峦叠列,巍峨险峻,山有石峡,峡中有峪;峪中泉水淙淙,鸟雀喧鸣;山上松柏蔽日,野花飘香,风景十分优美。因此,在文殊山的山上山下建有众多的寺庙和庵观,这些寺庙多建在奇峰异岩之上,最早修建于南北朝时期,后历经隋、唐、西夏、元、明、清,各代不断增修,兴盛时,寺庙三百,石窟百余,逐渐形成完整的古建筑群落,雄壮玄妙,蔚为南山佳景。后经岁月沧桑侵蚀,寺院建筑遭到严重破坏,尤其在文革期间,文殊山建筑毁灭殆尽。

文殊山是河西九大石窟寺之一,始凿于十六国北凉时期,经过魏晋时期开凿和修缮,到唐宋时期达到鼎盛,距今约有1500多年历史,是研究十六国时期佛教艺术的珍贵资料,对研究河西地区与西域的佛教建筑、艺术关系有重要价值。文殊山洞窟依山势开凿于文殊山前山和后山的崖壁上,分布在南北1.5公里、东西2.5公里的范围内。现存有魏晋、隋唐、西夏、元明清各个时期遗存的石窟造像及壁画洞窟庙宇40余座,珍贵佛像500余尊,壁画1200多平方米。保存较好洞窟有前山千佛洞、万佛洞、文殊寺石窟,后山古佛洞、千佛洞及禅窟等,尤以前山千佛

洞内的北凉壁画和万佛洞内的西夏壁画最为珍贵。



文殊山石窟在一些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载。如《肃州志》记载:“城西南三十里的山峡之内,凿山为洞,盖房为寺,内塑佛像,旧称三百禅室,号曰小西天”。清乾隆二年(1737年),黄文炜、沈青崖纂修的《重修肃州新志》记载:“文殊山,在城西南三十里。山峡之内,凿山为洞,盖房为寺、曰大土清庵,曰台子寺、曰接应殿、曰亥母洞、曰元觉庵、曰千佛阁、曰观音堂、曰玉皇阁。古阙无数,旧称有三百禅室,号曰‘小西天’”。现存元代泰定三年(1326年)元太子喃答失所立的《重修文殊寺碑》载:“肃州西南三十里嘉峪关者,乃一切贤圣栖神化远之心,林泉秀美,洞壑寂寥,神光现于长空,石室藏于畔侧,爰有郑善建,睹此祥瑞,发心修盖文殊殿,已经年远。今遇喃答失太子……观文殊圣寺,古迹建立已经八百有奇……”。



叶伯和

四川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

□ 王小梅

1938年10月26日成都《华西日报》副刊有一篇标题为《成都文坛回忆记》的文章。文章开头写道:“诗人叶伯和在成都撒下了新文学的种子,第一个文艺刊物——《草堂》,在成都出现。自然,这一定是遭受过顽固的老夫子的嘲笑和毒骂,因为这种形式的争执,在成都,新文艺竟涂上了一层暗淡的阴影。”

创办四川第一个新文学研究会,出版四川第一个新文学刊物《草堂》,第一个登上音乐专修科讲堂讲授中西音乐理论,介绍西洋音乐知识和乐器,最早撰写《中国音乐史》的是成都人叶伯和。这样一位新文化运动和音乐研究与教育的先驱者,的确值得人们怀念。

叶伯和的祖辈由广东迁来四川,世代务农,后成为地主。到了叶伯和的父亲出世,叶家已成为“耕读之家”。父亲叶大丰是个独子,12岁应童子试,考中秀才榜首,轰动一时。叶伯和自幼聪颖好学,成绩优异,深得师长和家人喜爱。在叶家先辈中,还有一位叶介福,精通七弦,是清代著名川派琴师、青城道士张孔山的门人。叶氏族中能弹琴的颇不乏人。叶伯和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,从小就接受了文学、音乐的教育和熏陶。

清光绪三十四年(1908年),年满17岁的叶伯和同弟弟叶仲甫,随父亲叶大丰离家到日本求学。

父子3人到了日本后,分别进入法政大学和东京音乐学院学习。叶伯和在日本留学期间,与早在日本东京音乐学院和帝国大学生学习的萧友梅(我国著名音乐教育家、作曲家)相识,从此,两人交往颇密,叶受萧的影响,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。3年后,即1911年,父子3人分别读完法政大学和音乐学院,带着珍贵的小提琴以及各种有关钢琴和小提琴的教材、乐谱等启程回国,不久回到了家乡成都。

在成都叶氏寓所指挥街,大门上有一副对联:宋少师后,明宰相家门,一木刻,一个是木刻的“律师叶大丰”。另一个是铜铸椭圆形,上铸“音乐家叶伯和”。民国初元,这在成都尚属破天荒。

此时,正值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,叶伯和当即在军政府受聘任职,作了财务部门一名干事。一年后,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,大汉四川军政府撤销。自此,叶伯和便致力于音乐教学与研究,并进行创办文学社团等活动。

当时成都人写了一首竹枝词:“京班名角教贫儿,丝竹嗷嘈关帝祠。科举文章无用处,改良戏曲作传奇。”28个字所描写的是在祠堂街关帝祠(现今艺峰照相馆右侧)内组织的一个京剧科班,亦称“剧部实习处”,叶伯和担任实习处经理。这个科班吸收了一些贫家小童儿作学徒,聘请当时外地来成都演出的京剧演员任教。此科班从成立到结束,前后只有两年多的时间,但它是四川人办京剧科班的最初尝试。

1912年后,叶伯和历任崇实学堂、成都县立中学校、川中师范学校、单级教员养成所、益州女学校、省第一中学等校教员。1914年9月,他接受四川省高等师范学校的聘请,任该校1915年春季开办的体育、乐歌专修科的音乐教员,直到1924年离开。

作为当时四川最高学府的高师,是四川第一所开设体育、乐歌专修科的学校,叶伯和则是四川第一位教授音乐专科课程的教师。

当时高师专修科招生的标准是“品行端正、身体健康、年龄在18岁以上25岁以下,在师范学校、中学校毕业或有同等学力者。”分设两个班,修业3年。音乐课程的内容有乐歌、唱歌、乐典、乐器使用法、理论、和声学、音乐史等。

1915至1924年,叶伯和潜心研究中国音乐,并结合长期教学经验,编著了我国最早的一部《中国音乐史》。在这10年间,他造就了四川,乃至西南第一批音乐师范专门人才。他是四川第一个介绍和使用五线谱,第一个教授钢琴、风琴、小提琴等西洋乐器,讲授唱歌技能及乐理、和声学等西洋音乐理论的教师。他是新音乐在四川以至西南的启蒙者和奠基人。

叶伯和授课之余,还为成都多所学校谱写校歌,进行音乐创作活动。歌词大多是自己所作。遗憾的是,这些乐谱已无处可寻。现仅有一首成都中学(今外南磨子桥七中)的校歌,歌词(注:成都中学校址是前芙蓉书院)是:

芙蓉的花那么红,它又不怕秋风,
芙蓉的叶那么青,扶着它更鲜明。
看此日莘莘学子像枝叶一样茂,
它年齐济多士像鲜花一样红。

——是“三变”的精神,且看他夙夜匪懈,皆由本固根深。

作为同盟会成员的叶伯和,思想上无疑是追求革新。五四运动前两年(即1917年)专修科首届毕业生即将离校(首届生为两年制),叶伯和作诗勉励学生,有“君不见郑卫之音乱雅乐,改弦更张勿畏缩。”之句,表达了他对青年一代热情的鼓励和期望。这也正是他自己孜孜不倦地研究和传播新音乐的执着精神的写照。(连载一)